


傅璇琮 主编

宁波通史

清代卷

 宁波出版社

傅璇琮 主编
乐承耀 著

宁波通史

清代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通史. 清代卷/傅璇琮主编;乐承耀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43-403-0

I. 宁… II. ①傅… ②乐… III. 宁波市—地方史—清代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2886号

责任编辑 沈建国 何小平

本书为宁波市重大文化研究工程项目成果

导 论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王朝，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先后经历了10个皇帝268年时间。

一

在明王朝衰落之际，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在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后，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政府之后的全国性政权。紧接着，清军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统一九州的战争。经过激烈征战，清军横扫明朝的残余势力，克扬州，占镇江，陷江阴，攻嘉兴，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直逼浙东。清廷采取军事镇压和迁界相结合的强硬手段，使宁波人民深受其害。清军的血腥屠杀和残酷迫害，激起宁波人民的强烈反抗，浙东燃起了抗清斗争的熊熊烈火。卷入斗争的阶层十分广泛，南明鲁王将领钱肃乐、张煌言等领导的抗清斗争方兴未艾，王翊、王江的“四明山寨”抗清也声势浩大。

在对浙东义军的血腥镇压之后，清廷在宁波逐渐建立统治。在宁波设府、县，并设宁绍台道，由道员、知府、知县执政。在地方基层政权实行里甲制和保甲制度。这是清廷在宁波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浙东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又是滨海之地。为此，清廷对宁波管制和防范较严，驻有绿营兵，并设海防水师。清初，袭明制，在各

卫所屯驻军队。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加强思想领域的统治,屡兴文字狱,这也是导致浙东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宁波民众起来反抗的重要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绝不是偶然的。这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过程是分不开的。英国在17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又进行了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英国资本主义要获得迅速的发展,必定要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英国商人开拓商品市场的目标,而宁波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和发达的海外贸易,对英国殖民者有极大的吸引力。为此,他们用种种手段对宁波进行窥测,把夺取时属宁波府的定海(今舟山)作为首要目标。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是政治的继续。英军对宁波发动侵略战争正是他们对华侵略的必然步骤和既定政策。鸦片战争中,宁波战场的地位极为重要,是英军侵华战略的中心环节,对英军的战略变化起着重要影响。英军两犯定海,对镇海、宁波进行惨无人道的劫掠。宁波军民第一次面临着西方殖民者的暴行,为此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林则徐的镇海防务,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定海“三总兵”的浴血奋战,朱贵的英勇抗争,裕谦的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曲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赞歌。由于认识、观念的局限及武器的低劣,清政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宁波人民不但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而且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任务。宁波开埠,虽然是被迫的,但毕竟使宁波更趋开放,对日后宁波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八日(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宁波府所属各县及余姚、宁海也先后被太平军所占。太平军在宁波府发布告安民,建立政权机构,整顿社会秩序,编户口和颁发门牌;造田册,计亩纳粟;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征收商税;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坚持海关、关税自主权。“辛酉政变”之后,中外势力开始互相勾结。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密切配合,向驻甬的太平军进行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尽管太平军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宁波重陷清军之手,各县太平军也被迫撤退。

随着法国殖民者对华作战的深入,清廷加强了浙东的防务。刘秉璋、欧阳利见、薛福成等人在镇海的筹防,加强了浙东的防守力量。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法军舰进犯镇海,中法战争镇海战役爆发。由于战前准备充分,并获得浙东人民的支持,加上爱国将领的正确判断和身先士卒,镇海之役取得了胜利,它再次显示了宁波人民具有反侵略斗争的力量。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势日危。逐渐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民族危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对清朝的封建专制和纲常伦理进行批判,兴起了维新活动。宁波作为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也受到影响。甬上的先进人士宣传维新,创办实业;兴学育才,创办报刊;设立学会,编练新军。与此同时,宁波各界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通过《德商甬报》,抨击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并开展反对意大利索取“三门湾”的斗争。

庚子赔款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华掠夺和控制,外国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宁波同样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清廷想从变革中寻求生路,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设立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和开展预备立宪活动。不少人对清政府的自我政治变革也充满希望,积极投身于宁波新政和立宪活动,创办警政,改革府县行政机构,参加浙江咨议局的选举,建立近代司法制度,组织地方自治。不论当政者主观意愿怎样,这些活动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效,由此揭开了宁波政治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页,推进了宁波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然而,局部的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宁波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革命、共和的道路。他们开展抵制美货的斗争和争路权运动;参与光复会、同盟会的活动;追随孙中山,接受三民主义的纲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建立同盟会宁波支部。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策划响应起事,筹建“民团”、“商团”,组织力量进行辛亥宁波光复,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建立了军政分府。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宁波军政分府,尽管只存在半年多的时间,但毕竟是近代宁波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清王朝在宁波的统治,使宁波人民受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教育,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解放。从太平天国在宁波建立农民政权到宁波军政分府的建立,相距半个世纪,从农民斗争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宁波的历史也向前进了一步。

二

清代宁波社会经济中既存在着传统生产方式,也滋生着新型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炮舰政策改变了宁波社会经济缓慢发展的状态。

清代宁波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大地超过前代。

在清代,宁波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面对明末清初的浙东战乱和农民大量逃亡、耕地严重荒废的破残景象,地方政府实施垦田政策,清丈土地,扩大耕地面积,招徕流民,缓征和豁免田赋。水利设施的兴修是发展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地方官吏把兴修水利看作发展农业、富国利民的要政,重视水利的整治和修筑;同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种植水稻、麦类等传统作物的基础上,开展经济作物的种植,改良品种,提高栽培技术,合理施肥,整治耕地。尤其是在晚清,宁波的生产工具较前代有不少改进和革新,耕作灌溉工具进一步发展,农业产品的加工技术也有提高,开始出现机器加工。宁波逐渐从传统的

农业向近代农业过渡。

清朝前期,宁波的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突出表现为官营手工业的逐步衰落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一些行业向民间开放,如盐业、酿酒业及造纸等行业被民营手工业取代,商品性生产的手工业向广大农村扩散,成为这一时期宁波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特征。民间手工业在棉纺织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现了一批与农业分离、专事棉织的手工业者。纺织业有所发展,但主要是民间纺织业。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宁波手工纺纱开始衰弱,洋纱、洋布迅速增多。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竞争,一些地主、官僚和商人用西方的机器从事棉纺业和织布业,诸如鄞县纬成布局和通久源织布厂等。机器纺织、榨油业和机器印刷企业也时有出现。由于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手工业开始和农业分离,一部分手工业者向城镇集中,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这一时期宁波手工业的发展,在市场、雇佣劳动、企业制度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宁波近现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物质基础。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宁波商业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随着全国政局的稳定,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宁波商业逐步兴盛起来。乾隆年间(1736—1795年),商业繁荣。据雍正《宁波府志》记载,当时宁波城区以鼓楼为中心,形成东直街、西直街、开明街三条商街。清中叶以后,宁波出现江夏、灵桥门、药行街等商业区。同光年间(1862—1908年)江北商业十分繁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洋货”不断输入,宁波市场发生一些变化,城乡人民的生活与商品市场的关系日趋密切。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宁波集市越来越多,开市日期增加,出现专业集市、综合集市、转运集市等不同类型的集市。宁波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集市兼备,既有所侧重,又互成网络,构成宁波区域市场群体。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宁波集市的功能和作用十分显明,它满足了当地民众生活和生产的需求,把相对孤立的分散的集市联系起来,沟通宁

波与全国及海外市场的商品流动,从而推动浙东乃至全省、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宁波港的发展和宁波帮的形成。钱庄、典当铺与银行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由于清代商品经济发达,宁波的钱庄和典当铺在市区及各县普遍开设,滨江的江夏街钱庄业繁荣,宁波钱业商人首创的“过账制度”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清末,银行的开办,有力地促进了宁波经济的发展。

近代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清代宁波经济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宁波开埠后,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已经开始产生和发展,美华书馆是外资在宁波开办的第一家企业。同光(1862—1908)以来,上海的“旗昌”、“逊昌”、“宝隆”等洋行到宁波拓展经营业务。与此同时,宁波开始出现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但其规模较小。以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慈溪火柴厂和民营航运业为代表的宁波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产生。通久源轧花厂的创办揭开了浙江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序幕,在全国也名列前茅。清末,宁波民族资本企业达37家。宁波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进步,是近代生产力的代表,对于宁波乃至浙江近代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当然,宁波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缓慢,行业集中在轻纺、航运,经营规模小,投资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少宁波籍的实业家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苏州、杭州等口岸城市经营新式企业。特别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在商贸、航运业独占鳌头,而且金融资本雄厚,执上海商会之牛耳,使宁波商帮在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宁波商帮形成于明清,区域环境、商贸文化的影响,丰富的经营实践成为宁波帮形成的重要条件。明清政府海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促成了宁波走私贸易的兴盛和海商集团的形成和壮大。乾嘉年间(1736—1820年),大多数宁波海商向内商转化,从事国内埠际贸易,在全国各地设立会馆。尤其是咸丰三年(1853年)后,甬商在漕运方面发挥明显作用,出现了“南北”船号,涌现了李也亭、董棣林等沙船集团。他们积累资本后,遂投资近代的工业、交通、金融及各项新兴产业,涉足全国,在国内形成7

个商贸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商贸区;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商贸区;以汉口为中心的湘鄂豫商贸区;以广州、厦门为中心的粤闽赣皖商贸区;以重庆为中心的渝川贵滇商贸区和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商贸区;以香港为中心的海外商贸区。

宁波是港口城市,自古以来海外贸易兴盛。到了清代,宁波港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民间贸易依然存在,一度相当活跃。管理宁波对外贸易的是浙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宁波设立,监管船只、货物,征收关税。乾隆年间(1736—1795年),浙海关仅处理国内贸易和中国商人出海事宜。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宁波江北岸设置税务司,建立浙海新关,专征国际贸易税。由于闭关政策的影响,宁波港口发展和海外贸易发展曲折。清初,宁波商人冲破清政府的“海禁”,与日本等国进行贸易,一时比较兴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允许广州一地贸易,宁波港停止对西方商船的“稽征”。但国内埠际贸易有所扩大。嘉道年间(1796—1850年),宁波港与国内沿海诸港贸易有很大发展,由于自然经济的抵抗,开埠初对外贸易遭遇挫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宁波港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宁波的商品市场及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宁波近代化的进程。

三

这一时期,封建政权摇摇欲坠,中西文化产生剧烈碰撞,由此所引起的封闭与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困惑与希望。宁波的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必然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宁波学校教育比较发达,府、县学得到长足发展,书院遍及宁波,甬上证人书院、姚江书院、辨志书院成为讲学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地方。清代科举取士在宁波影响不小,经过科举考试的状元、进士人数众多,名列浙江前茅。晚清,宁波的近代教育和新式学堂在省内有其影响。

宁波较早出现留学热潮,是浙江省最早派人出国留学的地区。同时,藏书业也有新的发展。

清代宁波的科学技术有所发展,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晚清科技领域中,宁波籍的科技人才也有一席之地。

明清之际,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与当时“天崩地裂”的形势已经不相适应,学术思想在浙东重新活跃起来,涌现出一批有唯物主义和民主启蒙思想的进步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主张经世致用,以鲜明的观点,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性质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形成了以黄宗羲、朱舜水、邵廷采、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在整个清代具有影响的浙东学派,使宁波的学术思想取得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成就。

宁波思想家在哲学、经学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黄宗羲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气一元论”,朱舜水注重“践履”,潘平格、黄宗炎强调事物都在变化。这些思想都是比较深刻的。至于经学成就也显而易见,仅与《周易》、《尚书》相关的著作就撰有37部,涉及作者24人。主要代表为黄宗羲、万斯大、黄宗炎、姜炳璋、黄以周等。他们主张“经世致用”,经学与现实密切结合,有关民主启蒙、以民为本、清廉政治、工商皆本,这些切合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灼见,不仅在当时有其影响,而且对后世依然有其价值。

浙东学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浙东在清代有三位史学大师。黄宗羲是清代史学的开山祖,传承其史学的是万斯同和全祖望,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此外,邵廷采、邵晋涵也长于史。他们在史学方面著作宏富,享有盛名,开学术史之先河,为明史纂修作出贡献,在史学的考订和辑补方面也卓有成就。到晚清,史学成就虽然没有清代前中期的辉煌,但也有一定发展,主要代表是徐时栋、董沛、陈康祺、陈汉章。时任宁波知府的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也反映了咸同年间(1851—1874年)浙东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

在清代,宁波涌现出不少文学家,在诗、词、散文、小说各个方面取

得了重要成就。清代前期的宁波文学,受到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清廷的屠城、迁界、海禁以及对浙东抗清力量的镇压,激起宁波民众的极力反抗,这些用热血铸成的史诗题材,使清初的宁波文学打上了时代印记。无论是黄宗羲、张煌言,还是李邨嗣、姜宸英,他们的诗文都记录了浙东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抗清斗争的艰苦历程和浙东抗清之士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沈光文的《台湾赋》等作品,对于台湾的历史、风土人情进行讴歌,文字优美,辞藻华丽,是富有影响的散文。乾嘉年间,文字狱致使许多学者钻入考据之中,他们的诗文创作远离现实,厉鹗、倪象占的作品多以山水、歌舞、咏物怀古为主题,反映社会矛盾的内容比较少。当然,全祖望的诗文富有成就,对浙东的抗清英烈多有描述。晚清的宁波文学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特征。镇海诗人姚燮,通过其诗文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人民的苦难和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揭露了外国殖民者的暴行,反映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感。光绪间(1875—1908年),王治本的旅行诗也有一定影响。

艺术领域也取得一定的成就,能书善画者不胜枚举,分布宁波各县。姜宸英、梅调鼎、姚燮、赵叔孺等书画家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不少影响。戏剧得到长足的发展,除了出现一些剧作家外,甬剧、姚剧、曲艺兴盛,宁海的平调流行于台州以及象山、奉化。

四

为全面展现清代宁波的历史,本书还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清代宁波的社会构成、社会救济、社会生活、社会风俗及其变迁作了阐述。

在清代,社会结构也是呈现出一个等级阶梯的形态,这在宁波同样存在。人们生活在各自的等级之中,“上下尊卑”、“士农工商”的等级定位不可逾越。但所有的等级集团中内部也有其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的差别,从中又可以区分不同的层次。鸦片战争后,宁波的自然

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社会结构中旧的阶级及阶级关系走向衰亡,新的阶级开始形成,并逐渐走向壮大。

由于清代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也呈现出与以往各个朝代不同的特点。由于受清代的政治制度、政治礼仪、政治思想及其所倡导与宣扬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影响,宁波的社会风俗都带上时代的烙印,又因在浙东区域而带上这个地区独有的特色。

清代,宁波的政治变化、工商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动宁波人口的变化。清代宁波人口的变迁是曲折的,但总体是增长的。由于清初的浙东战事、迁界和康熙十七年(1674年)的“三藩之乱”,宁波人口持续减少。“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和摊丁入亩政策在宁波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清代前期宁波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宁波人口的快速增长,乾嘉时期宁波人口的发展到了高峰时期。在晚清,宁波人口也有变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事,使宁波的人口蒙受很大的损失,宁波的民众遭到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的屠杀,大批工商人士为避战火赴上海等地。同治中期,宁波的人口又出现回升,其原因是“难民”的回乡与外地人口的迁入。光绪以后,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为人口的自然增长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宁波人口迅速向上攀升,到宣统末年(1911年)大幅增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在城市。

研究清代宁波人口的发展,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宁波人口状况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多,对当地经济发展会发生影响;但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宁波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密度过高,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致使土地紧张,地价上升,粮食种植减少,造成下层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农村与城市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清代,宁波的农村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大,农民的种植业和手工业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经济结构出现

了变化。由此,在宁波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下,农村务农人口急剧减少,从事工商业人口日渐增多,中心城镇逐步形成。城镇经济不单单是量的扩张,更在于质的发展,一些近代工商业开始在一些市镇出现,不少资产阶级化的士绅、新式商人和新型知识分子活跃在城镇的政治舞台上。与此同时,城市近代化进程加快,不仅使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有所变化,而且使近代交通业、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形成了新的人口职业结构。宁波开始呈现出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结构,成为近代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清代,宁波的社会救济事业比前代有所进步,一个重要表现是宁波当局和民众对灾荒的赈济和常平仓、社仓、义仓的设立。这种举措是在受灾的宁波民众抗粮、抢米以及抗清斗争中出现的。因为封建统治者深感灾害以后民众的社会动乱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如不加注意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从社会救济的主体看,清代宁波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除了政府资助以外,不少是“善士”个人的捐赠,而商人和有产者更是占据主要部分,尤其是那些在外发迹且资本雄厚的宁波帮企业家。宁波商人在晚清慈善机构的创建中作出过一定的努力,他们参与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建立,在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清代宁波的政治与军事	(1)
第一节 清军入主浙东与宁波民众的抵抗	(2)
一、浙东沿海的武力镇压与迁界	(2)
二、钱肃乐的抗清斗争	(6)
三、张苍水的抗清斗争	(8)
四、大岚山的王翊抗清	(11)
第二节 清朝在宁波的统治	(14)
一、宁波的地方行政建置	(14)
二、兵制与海防	(20)
三、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	(25)
四、赋役改革与赋税管理	(28)
五、社会矛盾激化与民众的反抗斗争	(40)
第三节 鸦片战争在宁波	(45)
一、英军两次进犯定海	(45)
二、英军进犯镇海和宁波	(52)
三、奕经“五虎制敌”计划的失败	(59)
四、宁波开埠及其影响	(63)
第四节 太平天国政权在宁波的建立和丧失	(69)
一、太平军进军宁波	(69)
二、太平天国在宁波的政权及其制度	(74)

三、 太平军在宁波的保卫战	(83)
第五节 光绪时期的宁波	(89)
一、 中法战争中的镇海战役	(89)
二、 宁波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99)
三、 救亡思潮和反对意大利索取“三门湾”的斗争	(107)
第六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宁波	(113)
一、 抵制美货的斗争和收回路权运动	(113)
二、 新政、预备立宪在宁波	(119)
三、 光复会、同盟会在宁波的活动	(131)
四、 辛亥宁波光复和军政分府的建立	(137)
第二章 清代宁波的经济	(143)
第一节 农业与渔业	(144)
一、 清初的垦田政策	(144)
二、 水利设施的兴修	(149)
三、 农业的生产结构	(155)
四、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163)
五、 发达的渔业	(166)
第二节 手工业	(170)
一、 纺织业	(170)
二、 丝织业	(173)
三、 造纸与印刷出版业	(176)
四、 制盐业	(178)
五、 酿酒业和榨油业	(181)
六、 席草编织业	(183)
第三节 商业	(186)
一、 城区商业发达	(186)
二、 集市贸易的发展	(191)
三、 钱庄、典当与银行	(198)
第四节 宁波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206)

一、 外资企业的出现	(206)
二、 洋务运动与宁波近代官办企业	(210)
三、 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217)
第五节 宁波商帮	(233)
一、 宁波商帮的形成和发展	(233)
二、 宁波商帮的地域分布	(239)
三、 宁波商帮的经济地位	(246)
第六节 宁波的港口发展与海外贸易	(257)
一、 清代前期的宁波港口与海外贸易	(257)
二、 乾嘉时期的宁波港口与海外贸易	(263)
三、 晚清的宁波港口和海外贸易	(268)
四、 温州、杭州开埠后的宁波港口与海外贸易	(274)
五、 海外贸易对宁波经济的影响	(276)
第三章 清代宁波的教育与文化	(279)
第一节 教育与科举	(280)
一、 府、县学的设置与书院、义学的发展	(280)
二、 科举制度在宁波	(287)
三、 晚清的宁波教育	(294)
四、 藏书业的发展及贡献	(307)
第二节 史学成就	(318)
一、 清代前中期宁波史学家及其贡献	(319)
二、 晚清的史学成就	(327)
三、 地方志的纂修	(330)
第三节 文学成就	(336)
一、 清代前期的文学成就	(336)
二、 清代中期的文学成就	(345)
三、 晚清的文学成就	(352)
四、 清末的小说	(360)
第四节 哲学与经学	(363)